

China Labor Economics

(2005 Vol.2 No.2)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 年第2卷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组织编写

迁移与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

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中国的案例

中国离一元社会保障体系有多远

人力资本投资是否解释了父母受教育水平

与孩子学习之间的关系

中国城市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基于占优策略均衡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税费制度的改进

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国际经验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

傅晓岚 V.N. Balasubramanyam

都阳 高文书

Philip H. Brown

丁赛

马理 吴金光

王智勇

China Labor Econom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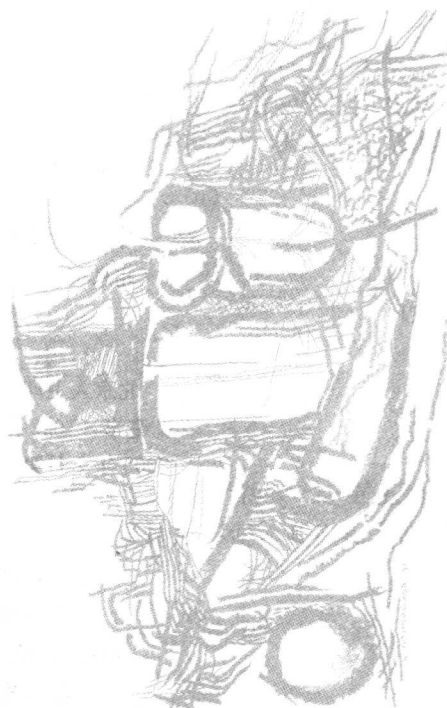
(2005 Vol.2 No.2)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年第2卷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组织编写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劳动经济学. 2005 年第 2 卷第 2 辑/王德文, 张建武, 都阳主编.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5

ISBN 7-5045-5299-2

I. 中… II. ①王… ②张… ③都… III. 劳动经济学-中国-文集 IV. F2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152 号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惠新东街 1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出 版 人: 张梦欣

*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装订 新华书店经销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37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3500 册

定价: 20.00 元

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64929211

发行部电话: 010-64911190

出版社网址: <http://www.class.com.cn>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4911344

中国劳动经济学

China Labor Economics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德文 张建武 都 阳

学术委员会主任 蔡 昉

学术委员会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鲁 王延中 孔泾源 左学金 田小宝

白南生 朴之水 (Albert Park) 刘燕斌

苏海南 李 实 李永杰 李培林 杨云彦

杨河清 杨宜勇 何 平 宋洪远 张车伟

张俊森 陈金永 (Kam Wing Chan)

金喜在 孟 昕 赵耀辉 胡鞍钢 姚先国

袁志刚 莫 荣 葛 强 (John Giles)

曾湘泉 蔡 昉

目 录

主引导读.....	都阳(1)
-----------	---------

论文

迁移与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 (3)
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中国的案例	傅晓岚 V. N. Balasubramanyam (28)
中国离一元社会保障体系有多远.....	都阳 高文书(45)
人力资本投资是否解释了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孩子学习之间的关系 ...	Philip H. Brown (60)
中国城市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	丁赛(75)
基于占优策略均衡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税费制度的改进.....	马理 吴金光(87)
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国际经验.....	王智勇(96)

文献综述

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与横向比较.....	吴淑姣(111)
--------------------------	----------

经典文献介绍

微观层次的福利估计	Chris Elbers Jean O. Lanjouw Peter Lanjow (125)
-----------------	---

Contents

Words form Editor in Chief *Yang Du* (1)

Papers

- Migration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 (3)
- Export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The Case of China
..... *Fu Xiaolan and V. N. Balasubramanyam* (28)
- How Far Is China Away from an Integrat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 *Du Yang Gao Wenshu* (45)
- Do Investments in Human Capital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Education and Child Learning? *Philip H. Brown* (60)
- The Impact of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on 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Ding Sai* (75)
-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ecurity Tax and Fee Basing on the Dominant
Strategy Equilibrium *Ma Li Wu Jinguang* (87)
-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Rural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s *Wang Zhiyong* (96)

Survey

- Dynamic Changes and Transverse Comparisons of Private Rate of Return to Education in
China *Wu Shujiao* (111)

Introdution to Classical Literature

- Micro-level Estimation of Welfare
..... *Chris Elbers Jean O. Lanjouw Peter Lanjow* (125)

主 编 导 读

都 阳

本期文章的选择仍然继承了以前注重实证,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的取向,选登了以下几篇论文。

《迁移与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是由两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撰写的研究论文。曾经有学者将迁移研究的一般范式总结为“CPI 模式”,即迁移的条件(condition)、过程(process)和影响(impact)。可见,在研究劳动力迁移的文献中,劳动力迁移所产生的影响是人们关心的重要内容之一。迁移劳动力在获得非农收入以后,如何使用这些收入,是两位作者关心的主要话题。对投资使用方向问题的研究,也是他们以前(Rozelle et al., 1999)研究的继续。在以前的研究中,他们曾经使用中国东北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过迁移收入对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正面影响,与劳动力迁移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短缺的负面影响之间的权衡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将两篇文章对照在一起阅读。

《出口、外国直接投资和就业:中国的案例》讨论了外资和就业的关系,本文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的研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经济中两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和不断增加的外贸依存度,并将二者联系起来。文章的实证结果认为:出口增加通过利用现存资源的投入使生产扩张,并为剩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本文对乡镇企业劳动力需求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中国离一元社会保障体系有多远》一文探讨的是中国农村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问题,文章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如果一元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劳动力市场和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中远期目标的话,那么,完善进城务工的迁移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将是向目标过渡的有效途径。

《人力资本投资是否解释了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孩子学习之间的关系》讨论的是中国西部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这篇文章也是作者以前(Brown, 2004)一项研究的继续。对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问题有兴趣的读者,把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阅读,将会对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本文充分展示了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人力资本问题的优越性。例如,对投入更准确、全面的度量使得作者可以更详尽地通过投入来考察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对下一代教育的影响。

《中国城市已婚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从性别视角观察了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差距问题。性别视角是思考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维度。然而,至少在目前,性别差异问题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基于占优策略均衡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税费制度的改进》一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社会保障制度设计的数理分析模型。作者推导了纯粹的市场机制会在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中引起市场失灵，而政策失衡又导致不可置信的威胁，因此，通过立法手段保证社会保障的收入来源是必要的。

《人力资本培育与农村社区学习中心的国际经验》也是一篇介绍人力资本形成的文章。作者介绍了在一些南亚国家，通过建立学习型社区，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经验。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实证性的分析，但它给我们展示了农村建设的另外一种模式。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的城乡差距问题，当有他山之石的效果。

《微观层次的福利估计》是我们根据国外学者新近的研究成果编译的一篇方法论方面的文章。这篇论文所提供的方法正日益得到从事贫困研究的学者和关注贫困问题的决策者的重视，我们称之为“贫困地图法”。其意义在于，通过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和综合利用，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描绘出贫困状态。而其研究结果和 GIS 等其他学科手段的结合，又可以给政策制定者以一目了然的现状描绘。当然，该方法不仅适用于贫困研究，也可用于解决很多其他的劳动力市场问题。

从更现实的意义上说，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都是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研究半成品，不对它们加以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实际上是资源的浪费。然而，正如有的学者（蔡昉，2005）所指出的，“贫困定位，……既有学术意义，……更具有政策含义，但是，该方法在中国的应用却受到可用数据的制约”。因此，通过介绍此方法推动公共研究资源的开放，也算是我们推出本文的初衷之一吧。

《中国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与横向比较》综述了关于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一些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相应的国际比较。为年轻的学者提供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舞台，是本刊的宗旨之一。我们也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不仅成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的读者，也成为她的贡献者。

论 文

迁移与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①

Alan de Brauw Scott Rozelle^②

【摘要】 本文就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在对中国农村不同地区的投资模式进行描述之后，我们运用一个理论模型阐述了迁移和投资的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进而利用 2000 年在中国农村收集的农户数据检验了这些假设，发现迁移在较贫困的地区会促进消费性投资增长近 20%。但没有发现迁移与生产性投资之间联系的证据。

【关键词】 迁移 中国农村 家庭投资

【JEL 分类号】 D1, J6, O1

迁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Williamson, 1988；de Haan, 1999；Taylor and Martin, 2001）。很多传统的关于迁移的文献主要关注迁移对迁移者（migrants）或迁入地（migrant destinations）的福利是否有积极影响（如 Ghatak et al., 1996；Borjas, 2003）。近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NELM）的文献，开始强调迁移对迁出地（source communities）发展的影响（如 Lucas, 1987；Adams, 1991；and Stark, 1991）。

由于农村地区缺乏完善的市场制度，迁移在资金积累中的作用也是复杂的。如果农户面临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则迁移者获得收入可以减轻资金约束。在短期内，农户可能将汇回的款项主要用于补充收入。从长期看，迁移和迁移者的汇款可能在农户的发展计划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果迁移者打算返乡，他们或许会对离开期间家庭的资金积累感兴趣。很多人都

① 本文是作者在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工作期间的研究成果。作者感谢该局的资金支持。但也很容易设想，一些农户会希望

为生产性投资。

这方面的文献虽然不多,但对迁移在资金积累中的作用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很多关于迁移的经济学文献研究了从墨西哥涌向美国的移民潮。这些研究一般都发现,墨西哥移民返乡并积累消费性投资的可能性大于进行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在描述一个墨西哥农村的生活时, Mines 和 de Janvry (1982) 指出, 尽管迁移者没有将他们的收入投资到生产性活动上, 但他们将这个村庄看作生儿育女和休养生息的地方。更近一些, Durand 等 (1996) 和 Taylor 等 (1996) 验证了墨西哥的迁移者更可能投资于住宅而不是增加家庭生产的活动。相反, Woodruff 和 Zenteno (2001) 估计投资于墨西哥小企业的资金中有 20% 左右来自汇回的收入。除了墨西哥, Dustmann 和 Kirchkamp (2001) 研究了从德国返乡的土耳其移民, 发现这些移民返乡后更愿意成为活跃的企业家, 并且主要是用他们在德国挣得的积蓄投资兴办企业。因此, 迁移会促进生产性投资还是消费性投资没有一个固定答案, 答案可能取决于当地的具体情况。

中国为进一步检验迁移和投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优秀的案例。中国农村迁移行为的迅速增加是 20 世纪 90 年代影响农村经济的最强大的变革力量之一 (Knight and Song, 1999; Rozelle et al., 1999; Zhao, 1999)。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 迁移取代其他非农活动成为非农劳动力市场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 (de Brauw et al., 2002)。随着劳动力从农村流出, 迁移者的汇款也增加了, 2001 年达到农村收入的 9% (Deininger et al., 2003)。在迁移迅速增加的同时, 劳动力的“回流”也开始增加, 带着其资源返回中国农村。许多研究者 (如 Murphy, 1999; Ma, 2001; Zhao, 2002) 指出, 汇款和回流到农村的迁移者是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重要源泉。实际上, 令关心农村社会收入增长和条件改善的政策制定者们非常感兴趣的是: 迁移如何影响迁出地的资金积累 (农业部, 2001)。

尽管迁出地呈现出重大的变革和发展前景, 却很少有研究者试图弄清楚迁移对中国农村家庭投资的准确影响。Murphy (1999) 和 Bai (2001) 记述了返乡后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迁移者, 但他们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 并且没有考虑其他因素。Zhao (2002) 发现迁移和农户投资总体上呈正相关关系, 但她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 她的模型也没有对无法观测的差异性进行任何控制。如果未观测到的因素与农户层次上的迁移相关, 她的结论会受到影响。

中国巨大的地区性差异可能使观测到的迁移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在财富和投资机会上都存在显著差异 (Nyberg and Rozelle, 1999), 这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迁移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例如, 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假设农户会利用迁移作为减轻信贷约束的策略。然而, 信贷约束的严重性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必定存在差异。在快速发展的沿海地区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周边的郊区, 农民在日益富裕,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不需要通过迁移为投资筹集资金。他们或许能够为投资自筹资金或者更容易获得贷款。实际上, Park 等 (2003) 发现, 在比较富裕的地区, 银行已经逐渐开始增加对农村企业的贷款。并且, 这些地区的企业也更容易获得非正规渠道的借款作为投资的资金来源。相反, 较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方面由于相对贫困而不具备自筹资金的条件, 另一方面又受制于信用机构的贷款配额而无法获得正式贷款。此外, 投资性质的性质也因地而异 (Mohapatra, 2003), 这可能会影响迁移者或回迁者是对生产性活动还是消费性活动进行投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检验迁移行为如何影响中国农村的家庭投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三项具体的任务。首先，我们将考察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参与和未参与迁移的农户之间在投资模式上的差异。其次，我们将构造符合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的理论模型，对农户迁移决策促进投资的机制进行解释。该理论模型将给出实证检验的若干假设，在这些假设中，我们特别考察了探讨迁移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带来农户投资增加的假设。第三，我们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以确定迁移是不是农户增加生产性或消费性投资的机制之一。为了考虑迁移和投资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关系，我们用农户固定效应模型（household fixed effects）和工具变量（IV）法对回溯性（retrospective）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

一、数 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作者在中国 6 省农村随机选择的 60 个样本村中收集的，基本上能代表中国的情况。这些省份是河北、辽宁、陕西、浙江、湖北和四川。为了保证每个省内的覆盖面，按工业生产总值将各省的收入分为五等份，从每一等份中随机选择一个县。图 1—1 给出了这些县。再在每个县中随机选择两个村。调查队使用了村的花名册，并对没有包括在村农户名单中的农户进行了调查。最后从中随机选择了 20 户，既包括本村户口的居民，也包括无户口的居民。农户调查搜集了长期以来关于人口、财富、农业生产、非农活动和投资的详细信息。调查队共调查了 1 199 家农户。



图 1—1 中国农村调查（2000）抽取的县

注：用白色圈定的区域是进行调查的县。

该农户调查的几个部分是为搜集关于生产和消费性投资的综合信息而设计的。我们对样

本中所有农户就他们过去 10 到 20 年进行的投资进行了一系列提问。投资要么被视作生产性的要么被视为消费性的,下一部分将对各类的定义进行详细说明。由于我们掌握了农户自 1995 年以来所有的投资和消费的数据,我们设计了一个变量度量自 1995 年以来的总投资,并称之为累积投资。

调查的另一个部分集中关注农户家庭成员和户主的子女当前和过去的迁移经历。调查员询问了所有家庭成员参与非农活动的情况,包括其雇主所在地(本地还是外地)、工资、是否被看作迁移者、迁移者 2000 年是否汇回过任何款项。^①此外,调查员还为各村大约一半农户的每个家庭成员及户主的每个子女完成了一份 20 年工作经历的表格(1 199 家中的 610 家)。我们还从样本中排除了在过去 5 年内新成立的家庭,剩下 585 户。这部分调查包括的农户是随机分配的。这份表格搜集了从 1981 年至 2000 年每一年的信息,包括从事的非农工作(如果有)的主要类型、工作期间户口所在地(在本村还是在村外,即在本地还是迁移)、工作地点、是否自我雇用及与务农的相关程度。我们将迁移者定义为任何没有正式离开家、从事非农工作、工作期间不在家生活的个体。进而,我们可以将回迁者(return migrants)定义为过去曾经迁移但后来回到家中的家庭成员。^②

二、投资和迁移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主要描述投资和迁移的类型及二者之间的联系。迁移无论如何只是农户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中国某些地区的商业环境会鼓励某种类型的投资(例如,生产性投资或消费性投资),而另一些地区的环境会鼓励其他类型的投资或完全抑制投资。例如,与商业环境较好地区的农户相比,商业环境较差地区的农户投资于生产性活动的可能性就更小。因此,在开始考察迁移为贷款提供替代选择的作用之前,我们应该对农户所生活的环境作更细致的描述。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信贷需求的快速增长(Shen, 1999)。在一些较富裕地区,农村银行已经开始愿意放贷,为农户提供投资机会(Park et al., 2003)。即便银行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提供贷款,很多地方的农户会从非正规贷款渠道借款,如放债者或其他非正规金融中介(Findlay, Watson, and Cheng, 2003)。在更加富裕的地区,足够富有的农户甚至能主要利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而在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地区,正规渠道的贷款很难获得,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信贷需要。贫困的农户显然也不太可能自筹资金。和更富裕的地区一样,如果正规信贷机构不存在,就产生了创建非正规信贷机构,减轻投资约束的压力(如 Aleem, 1990)。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户常常从亲朋好友那里获得零利息的借款(Park and Wang, 1999)。尽管这种类

① 就调查年份即 2000 年来说,迁移者是按如下方法判断的。首先将所有家庭成员分为两组,一组是连续 3 个月或更久不在家住的,另一组是户主尚未正式离家组建家庭的子女,但每年有 2 个月或更久不在家。在前一组中,在村外拥有非农工作、工作期间不在家住的人被认为是迁移者。在后一组中,因为就业而不是上学或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原因而离开家的被认为是迁移者。

② 在使用这些关于过去迁移和回迁活动的信息、数据以及任何其他随时间变化的信息时,本文所指的将是工作经历调查样本中的 585 家农户,这些家庭不是在过去 5 年中形成的。

型的借款很常见,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是为了满足由于意外打击造成的需要而筹措的,很少被用于资助生产性和消费性的投资。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 schemes),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贷款渠道,但这些项目并不是很普遍(如 Park and Ren, 2001)。在缺乏正规信贷渠道的贫困地区,迁移收入作为中国农户一种潜在的资金来源引起了诸多讨论(Bai, 2001; Zhao, 2002; Murphy, 1999; Rozelle et al., 1999)。

我们的样本数据显示,2000年,部分中国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仍然相当不发达,在相对贫困的地区尤其如此。具体地说,贫困地区的农户一方面难以从信贷市场获得资金,另一方面,即使得到借款,数量也非常有限。只有10%的农户能从正规渠道借款。并且,贫困地区银行借款的平均数量比富裕地区的一半还要少。而来自非正规渠道(大都是亲戚和朋友)的投资借款的数量也显著高于富裕地区。

由于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户获得资金的能力可能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农户转向替代性筹资机制的倾向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有所不同。因此,在随后的分析中,我们将在考虑农户所在地区财富水平的情况下分析迁移对投资的影响。此外,将样本划分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可能有助于考察投资的类型。例如,在贫困地区,农户或许不太可能通过迁移来为生产性投资筹集资金,因为这种投资的预期回报有限。

(一) 中国农村投资的测量

不考虑投资资金的来源,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家庭的投资行为非常活跃。本文将其划分为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可以将生产性投资定义为用于农业或非农活动,能增强农户获得收入的潜力的投资。^①消费性投资是直接改善家庭成员生活质量而不是通过增加生产帮助他们提高收入的投资。这类投资指在住房和耐用品上花费500元人民币以上的投资。在本文的其余部分,我们主要使用我们获得的自1995年以来农户投资总额的数据。^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计算相当于生产性投资和消费性投资之和的总投资。

在计算样本农户自1995年到2000年的投资总和时,我们发现,截至2000年,大部分

① 我们将生产性投资作如下分类:农业投资包括改良农业用地地力、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商业性农业投资。土地改良投资包括为提高粮食和蔬菜产量而进行的土地改良。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用于农业生产的拖拉机、耕犁或耕牛。商业性农业投资包括用于果园、鱼塘、林木以及其他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民得以生产价值更高的特色作物的投资。所有其他农户参与经营的企业都被视为非农企业。中国农村的这种企业形式多样,从农村小商店到较大规模的加工工厂都有。在搜集关于农户企业的数据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一些投资(例如:房屋)既可以用于消费性目的,也可以用于生产性目的。当发现农户拥有家庭企业并进行了住宅投资时,调查员会请农户估计住宅投资被用于生产的比例,进而在非农企业调查部分对此进行说明。

② 本文出现的所有名义价值都通过农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被标准化为其2000年的价值(CNSB, 2000)。2000年的官方汇率大约是8.27人民币比1美元。在多数投资类型上我们有更长时期的数据,但我们选择了加总自1995年以来的投资,原因有两点。其一,在更短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复杂的折旧处理的必要性就不那么强了。并且,由于我们没有追踪资产的利用情况,如果使用更少年份的数据,我们的总资产基数就能防止更多的误差。实际上,我们证实了如果只用5年的投资数据,我们的测量应该是相当准确的。在2000年,只有不到1%的农业生产资料被出售或废弃,意味着如果我们低估了2000年之前年份农户持有的生产资料的数量,由于忽略资产出售或废弃而导致的这种低估的幅度是很小的。此外,在整个样本中,只有5家农户完全丧失了他们自1980年以来投资过的土地。在农户失去他们投资过的土地的其他个案中,他们得到了某种形式的补偿。其二,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数据集包括的其他关于农户的信息自1995年或1996年开始发生了变化,使我们能够生成有关迁移行为、投资及农户其他经济和人口统计方面的追溯性面板数据。

农户都进行了生产性投资或消费性投资（见表 1—1，第 4 和第 8 行）。随着进行了生产性和消费性投资的农户比例的上升，投资量的平均数和中位数也上升了（生产性投资类见第 1 和第 3 行；消费性投资类见第 5 和第 7 行）。消费性投资的平均数和中位数远大于生产性投资相应的统计值，表明农户很大程度上选择提高生活质量而非增加收入的投资。由于消费性投资的价值以住宅为主，这一观测是与对 20 世纪 80 年代农村投资的一个描述相一致的（Feder et al., 1992）。^①

表 1—1

中国样本农户平均累积投资（按类型和年份）

单位：元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生产性投资						
均值	3 627 (7 360)	6 194 (26 205)	6 627 (24 980)	7 973 (26 410)	9 222 (27 520)	11 920 (40 510)
中位数	928	980	1 590	1 990	2 580	3 206
投资农户 (%)	18.7	28.5	35.9	45.2	52.1	61.5
消费性投资						
均值	16 770 (47 900)	17 690 (43 410)	17 510 (39 680)	18 830 (41 570)	20 670 (46 350)	22 600 (47 580)
中位数	3 341	3 700	4 531	5 132	6 347	7 893
投资农户 (%)	19.3	33.4	42.9	51.8	60	64.2
总投资						
均值	12 230 (38 340)	15 560 (45 310)	16 770 (45 240)	19 480 (23 470)	22 970 (61 060)	27 420 (72 720)
中位数	2 180	2 820	4 190	5 130	7 100	8 800
投资农户 (%)	32.1	49.3	59.0	69.0	77.2	83.0

注：本表只包括了那些能够获得其工作经历信息的农户。所有数据均用 2000 年的价值表示。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差。均值是按实际发生的投资计算的，排除了任何低于 500 元的农业投资或耐用品购买。

资料来源：作者的调查。

不论用什么衡量标准，自 1995 年以来总投资（生产性和消费性投资之和）都是不断扩大和增长的（见表 1—1，第 9~12 行）。给定已经发生的投资，2000 年中位家庭在过去 5 年内的投资约为 8 800 元（见表 1—1，第 6 列，第 11 行）。如果假设有四口人的中位家庭人均收入是 2 000 元并保持不变（CNSB, 2000），投资率就在 16% 左右。并且，我们的数据显示中国大多数农户（83%）都进行了某种类型的投资。因此，大多数农户资产的快速增长是与观测到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农村地区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相一致的。^②

（二）地区间的投资差异

尽管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农户进行了投资，累积投资的规模在样本省份之间和各省内

① 在住宅投资中，77% 都是新房屋，其他 23% 是扩大或修缮。只考虑了 3 000 元以上的修缮。

② 中国国家统计局（CNSB, 2000）估计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约为 5%。

部的各县之间有显著的不同（见表 1—2）。我们发现浙江省的农户进行的投资多于其他省份的农户。浙江 1995 年至 2000 年间的样本农户平均累积投资在 53 070 元左右（见表 1—2，第 2 列，第 1 行），比其他省份平均值的两倍还多（见表 1—2，第 1 行，第 2 和第 3 列）。考虑到浙江农村人均收入是中国最高的，浙江更高的投资水平并不出人意料（CNSB，2000）。

表 1—2 中国富裕县和贫穷县样本农户平均累积投资（2000）

类别	所有省份	浙江	所有其他省份
所有县	27 420	53 070	22 170
	(72 720)	(11 7520)	(58 380)
最富裕的县	52 000	134 900	33 780
	(139 720)	(228 600)	(104 700)
所有其他县	21 340	31 520	19 340
	(40 150)	(42 850)	(39 340)

注：括号中是标准差。所有数据都是 1995 年至 2000 年间的累积投资，按实际发生的投资计算。

资料来源：作者的调查。

在各省内部，不同县的投资也有显著差异，如果我们按财富水平对其进行排序的话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为了按财富水平对各县进行排序，我们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各县的平均工业生产总产值（GVIO）来帮助我们抽样。然后我们将各省工业生产总产值最高的县标记为富裕县，而将其他县标记为贫困县。在所有省份中，富裕县的平均投资水平都是贫困县的 2.5 倍左右（见表 1—2，第 3 和第 5 行，第 1 列）。在浙江和其他样本省份也发现了相同的模式（见表 1—2，第 2 和第 3 列）。如前所述，对于较富裕地区的投资水平高于贫困地区，我们并不意外，因为至少他们有更多可支配的资金来源。例如，较富裕地区的农户更有能力为投资活动自筹资金。他们也很可能比贫困地区的农户更易获得贷款。然而，我们非常想知道迁移是否会影响投资，所以我们必须寻找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不同模式。

（三）迁移农户^①的投资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迁移者还不到农村劳动力的 4%，而我们的工作经历数据显示，到 1995 年，大约 10% 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迁移，到 2000 年，这个比例接近 20%（见表 1—3，第 1 和第 2 列）。参与迁移的劳动力的比例在富裕地区一贯都略高于贫困地区（见表 1—3，第 3~6 列）。我们的数据还进一步显示，随着近年来迁移的快速增长，劳动力也加速向农村回迁。在我们的样本中，迁移者一般在大约 5 年之后回到农村。迁移和回迁发生的频率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相当接近，至少在我们的样本中是如此。

① 本文中，“迁移农户”一般是指有迁出者或迁出之后又回迁者的农户，在与“回迁农户”并列或对比时特指迁出的农户；“回迁农户”是指迁出之后又回迁者的农户；而“非迁移农户”则是指“迁移农户”和“回迁农户”之外的农户——译者注。

表 1—3

迁出者和回迁者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
(分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 1995 年和 2000 年)

(%)

类别	所有农户		富裕地区农户		贫困地区农户	
	1995	2000	1995	2000	1995	2000
迁出者	9.7	19.0	13.0	20.9	9.0	18.5
回迁者	4.9	9.1	7.9	11.9	4.1	8.4

注: 分别按所有调查到的 1995 年和 2000 年迁出或回迁的农户成员数计算。

资料来源: 作者的调查。

从农户的角度来看, 不论是迁移者不在的时候还是返乡之后, 迁移都能影响投资。尽管迁移者和回迁者影响投资的方式可能存在差异, 但我们在文中未加区分。在我们下一部分的理论模型中, 我们集中关注迁移总体上影响投资的方式。为此, 我们隐含地假设迁移者和决定返回迁出地是同一个过程的组成部分, 并且, 我们的假设没有区分这两个阶段的迁移。在本节的描述和第 4 部分的经济计量分析中, 我们定义了两个变量, 每年家庭成员中参与劳动力迁移的人数 (迁移者数量) 和回迁者数量, 尽管我们对两者中谁将对投资有更大或更小的影响没有先验的 (a priori) 预期。

在考察 2000 年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迁移与累积投资之间的关系时, 我们发现迁移农户的平均投资水平通常高于非迁移农户 (见表 1—4, 第 1 列)。在富裕地区, 有迁移者和回迁者的农户总投资水平比非迁移农户高大约 70%。在贫困地区, 迁移农户的总投资水平也要高出 20% 以上。

表 1—4

2000 年迁移状况及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户投资水平

单位: 元

类别	总投资	消费性投资	生产性投资
富裕地区农户			
回迁农户	25 900 (35 390)	14 720 (27 310)	11 180 (18 820)
迁移农户	24 630 (45 700)	18 990 (40 850)	5 640 (10 160)
非迁移农户	19 980 (31 930)	8 010 (12 660)	6 900 (26 810)
贫困地区农户			
回迁农户	21 510 (24 640)	13 770 (20 120)	7740 (11 600)
迁移农户	17 730 (29 750)	12 030 (26 210)	5 700 (8 890)
非迁移农户	15 800 (24 050)	8 380 (14 270)	7 420 (15 070)

注: 投资数大于 20 万元的农户的奇峰值被排除了。“迁移农户”一类不包括家中有回迁者的农户。括号中是标准差。“富裕地区”包括各省最富裕的县。

在分析迁移参与情况考察投资水平时,我们发现生产性投资模式与消费性投资模式差别很大(见表1—4,第2和第3列)。平均来看,迁移农户和回迁农户用于住宅和耐用品的投资在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都比非迁移农户多得多。消费性投资的模式和总投资的模式惊人地相似。相反,生产性投资没有呈现出清楚的模式。在富裕地区,回迁农户的平均生产性投资水平看起来高于非迁移农户;而在贫困地区,非迁移农户的生产性投资是最高的。

根据上述的描述发现,情形可能是这样的——如果迁移和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是迁移和消费性投资之间的,而不是迁移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因此,在考察了迁移农户和非迁移农户平均投资水平的点估计差异之后,根据我们的数据,有理由认为中国农村家庭可能通过迁移为投资筹集资金。然而,描述性分析有若干缺陷。点估计的标准误差较大。某些农户的大规模投资也造成了平均值的偏移,这在投资或收入数据中是很普遍的。因而,关于差异的统计真实性就值得怀疑。^①不过,最重要的是,几乎可以确信存在若干其他与迁移和投资共线进而使其关系变得模糊的因素。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提出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

三、迁移和投资的一个两期模型

虽然已有文献的描述性分析和观察显示,在迁出地,迁移农户的投资水平通常高于非迁移农户,但它们没有说明迁移是如何影响农户的投资行为的。迁移和农户投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尽管农户最终能够实现更高的收入(来自汇款或迁移支持的投资),在决定是否将迁移纳入家庭发展计划时,他们面临一些取舍。迁移毫无疑问意味着农户在当地生产可用的劳动力减少了,至少在迁移者返乡之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在描述性数据中观测到了相关性,迁移本质上也可能对投资只有很小的影响或没有影响。例如,有可能迁移农户原本就更富有(或本身更有能力),因而能够进行更多的投资。也可能迁移农户与非迁移农户处于他们人生周期的不同时间点,进行投资的情势更加有利。

在这一部分,我们根据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构造了一个模型(NELM; Stark, 1991)。Stark等人(如Lucas and Stark, 1985; Katz and Stark, 1986; Rosenzweig and Stark, 1989)指出,家庭与迁出地对于迁移者及其离开和(或)返乡的决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一些论文认为,人们进行迁移是将其作为风险应对策略的一个组成要素(如Stark and Levhari, 1982; Rosenzweig and Stark, 1989; Paulson, 2000),而我们则试图确定参与迁移是否使迁出地农户的信贷约束得以放松。我们在NELM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明确地将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的跨期替代(tradeoff)纳入了模型中。我们的模型考虑了迁移给农户带来的跨期成本并考察了农户的财富多寡会如何影响将迁移作为一种筹资方式的倾向。我们先对模型进行描述,然后得出有关迁移和投资间联系的实证假设并将在下一部分检验这些假设。

假设某农户的特征为 X ,劳动力禀赋为 $\bar{L}$,资本禀赋为 K ,在两个时期内利用其资本和劳动力、运用生产技术 $f(K, L, X)$ 生产一种产品。该农户从每一期的消费中获得效用,

^① 然而,当我们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值来构造表1—4时,我们在迁移农户和非迁移农户之间发现了类似的差异模式。